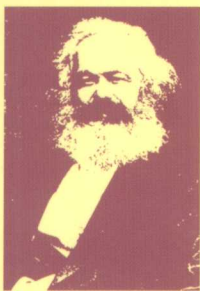




20世纪 西方马克思主义 哲学历程



The Journey of the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陈学明◎主编

第三卷 20世纪下半叶

“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两种倾向的对立与新派别的涌现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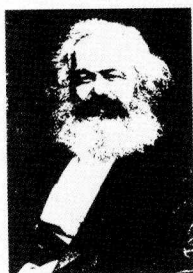
013029808

B089.1
60
V3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20世纪 西方马克思主义 哲学历程



The Journey of the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陈学明◎主编



第三卷 20世纪下半叶

“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两种倾向的对立与新派别的涌现



北航 C1635503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B089.1
60
V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 第 3 卷,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两种倾向的对立与新派别的涌现 / 陈学明主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2

ISBN 978 - 7 - 201 - 07873 - 1

I. ①2… II. ①陈…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 - 研究 - 20 世纪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8777 号

目 录

卷首语	1
第一章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用存在主义“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	27
第一节 列斐伏尔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对日常生活的研究	29
第二节 梅劳-庞蒂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48
第三节 萨特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68
第四节 哥德曼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走向“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86
第二章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	102
第一节 赖希开创了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综合”在一起的思潮	104
第二节 马尔库塞对爱欲解放论的系统论述	138
第三节 弗洛姆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出发对马克思学说的“改造”	149
第三章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探索	165
第一节 阿尔都塞开创了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诠释	169
第二节 普兰查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主义的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	182
第三节 巴里巴尔继承和发展了阿尔都塞的理论	196
第四章 “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主义解释	207

第一节	德拉-沃尔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辩证法的论证	209
第二节	科莱蒂对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论证	218
第五章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	
	主义	231
第一节	科恩开创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232
第二节	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及其用分析方法对剥削与正义等的研究	248
第三节	罗默借用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数学模型方法对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微观性的研究	259
第六章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271
第一节	哈特曼论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272
第二节	巴雷特的性别意识形态理论	278
第三节	沃格尔强调必须超越内在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综合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二元论	289
第四节	贾格尔主张妇女问题研究必须以对一些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为基础	299
第七章	“生态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生态危机	313
第一节	高兹借助对经济理性的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生态环境的必然性	317
第二节	阿格尔提出生态危机已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期望”“完全破碎”	352
第三节	莱易斯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	364

卷首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获得重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脱颖而出。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其他两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即以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为主体的第二国际传统的解释路向和以西方共产党理论家为主体的第三国际传统的解释路向,尚处于“三足鼎立”、平起平坐的状态,那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却后来居上,成为最有吸引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思潮。无论就其理论的建树还是按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都是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地位,除了其代表人物的主观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今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们的理论需求。正是由于考虑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特殊地位,我们在比较全面地剖析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各种思潮,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研究的基础上,专设一卷用以评析除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倾向和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的新进展,不仅表现在原先由卢卡奇等开创、由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与推进的那种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的扩展上,而且更见之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又形成了与之相对立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思潮。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是“独占鳌头”,那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则出现了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和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思潮“两刃相割”的局面。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理论家,汇合西方共产党的思想家、流亡至西方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继承第二国际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甚至还包括一

些“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共同去发现新的马克思,即“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马克思”,共同掀起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运动之时,起来抵制这一趋势并与之抗衡的不是来自于西方共产党或者其他号称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家,而是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些思想家。

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世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推动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思潮的,除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外,主要就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它是一个致力于“综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大致经历了这样四个发展阶段:马尔库塞开创了以存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先例;列斐伏尔继承马尔库塞,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推向新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梅劳-庞蒂成了综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系统地进行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作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集大成者是萨特。哥德曼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物,因为他早期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悲剧辩证法思想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比较起来相近,所以姑且把他与萨特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和流传的历史过程看,它产生于德国,但后来它的活动中心逐步由德国转移到法国。这与存在主义产生与流传的历史是相一致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有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以列斐伏尔为代表,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存在主义;另一种以梅劳-庞蒂和萨特为代表,用存在主义融合马克思主义。

列斐伏尔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他庞杂的理论体系中,下述四个方面的内容特别引人注目:其一,按照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其二,把日常生活作为哲学思考的主要对象,建立了一整套论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其三,重建马克思国家学说,提出“国家是从事欺骗活动的场所”;其四,提出“没有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但有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思想对1968年的学生造反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学生邦迪是“五月风暴”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改造生活”,“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把注意力放在生活的喜

悦上”，“让日常生活变成一件艺术作品”之类在“五月风暴”中流行的口号，都是列斐伏尔提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列斐伏尔早期最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的书名是“辩证唯物主义”，但实际上，列斐伏尔的这一著作通篇都是从存在主义出发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列斐伏尔在这一著作中提出了人的异化根源于人的本质之中，根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以及消除异化的途径是努力克服人的存在的分散性、片面性和神秘性，争取实现人的存在的总体等著名论点。《日常生活批判》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该书贯穿着他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系统解释。异化概念在他那里既是哲学概念又是社会学概念。列斐伏尔又从他的异化理论引申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列斐伏尔反对把日常生活看做一个位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领域。他强调日常生活是一个“平面”，它同社会的其他“平面”相比，更有其自己的意义，要比其他“平面”更加突出，因为“人”是在这里“被发现”和“被创造”的。他把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归结为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这种贡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即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具体批判主义。

梅劳-庞蒂是法国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梅劳-庞蒂的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调和折中、暧昧不明，当他致力于实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时，这种调和倾向则主要表现为，要对存在主义所强调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物质状况对人的支配的思想兼收并蓄，把他那种在个人自由决定（主观因素）和社会历史制约（客观因素）之间采取含混态度的观点当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梅劳-庞蒂用存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处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萨特的在历史观方面的绝对自由论”的“中间地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既强调个人自由的决定作用，又承认客观条件、“情景”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两者之间没有何者首要、何者次要的问题。梅劳-庞蒂激烈地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的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同唯科学主义、机械论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梅劳-庞蒂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门“人学”，强调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是主观存在”。梅劳-庞蒂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对立起来，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存在的哲学”。在他看来，马克思提出要“消灭”的不是作为一种思考方式的一般哲学，而是一种“孤立的哲学”。梅

劳-庞蒂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观”并不否定暴力的作用,而是把革命暴力、恐怖与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归纳出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观”的要点是:第一,把暴力、恐怖当做个人与他人、社会外界发生关系;第二,把暴力看做历史的客观因素的必然产物;第三,认为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实施暴力也是不可避免的;第四,认为暴力有革命和反革命之分,而革命暴力与人道主义相一致。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对卢卡奇于20世纪20年代初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作了归纳总结。他第一次明确地把卢卡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他总结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突出主体能动作用的主客体辩证法,为意识形态恢复了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把阶级意识等同于实践的实践哲学,注重偶然性的历史相对主义。梅劳-庞蒂特别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同列宁主义完全对立的。他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花了大量篇幅论述了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重要代表的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以说明它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水火不相容。梅劳-庞蒂还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对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思想中的辩证法思想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对立。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是萨特。萨特的思想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他尽管在政治上同共产党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在思想上从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时的萨特是个纯粹的存在主义者。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在政治上同共产党脱离关系,而在思想上却向着马克思主义“靠拢”,致力于实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改造”、“互相补充”。此时的萨特是个“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作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作是《辩证理性批判》。这一著作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对存在主义的“改造”与“补充”,更包含了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补充”。萨特用存在主义“改造”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论证了辩证法是一种历史辩证法、人学辩证法,即只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他从辩证法的来源及内容两个方面来论证辩证法只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他一方面强调,辩证法只能来源于个人的实践,辩证法是由人内部的非理性的意识活动所支配的个人的活动,即“个人的实践”;另一方面又提出,辩证法的内容就是整体化,而整体化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他认为,这种为人的实践、行为所实现的从个人到社会的整体化运动,正是辩证法的根本含义。萨特用存在主

义“改造”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另一件事是把存在主义的主观性“填补”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中去。萨特认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取消了主观性”,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尽管“提供了对历史的唯一合理的解释”,但不能“接近现实”。萨特在社会运动和认识运动中都把主观性置于出发点的地位上。在主观性面前,人与社会世界是同一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也是同一的,从而社会运动和认识运动也是同一的。因而历史辩证法对人具有内在性,正是由于这种内在性,辩证法才具有可理解性。萨特在论述自己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特别批判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他看来,承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会使辩证法的可理解性消失,会妨碍人的主观性、人的自由的发挥,还会陷入十足的神学。显然,他否定“自然辩证法”的根本出发点是其存在主义。

把哥德曼作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探讨有些勉强,但相比较而言,他的理论特别是他的“悲剧辩证法”思想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为接近。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一个介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个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主义解释引向结构主义解释的人物。对于一种辩证方法的诉求是哥德曼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贯穿于他的整个著作之中。在他看来,人是一种双重性的存在者,面对现实生活的有限性,他总是向往对于本真生活的追求,这种对于超越维度的寻求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人永远具有超越和扬弃自己局限性的要求和可能性,总是向往着一个无限美好的本真人类共同体,这种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推动着整个人类实践向前发展,同时这种矛盾也会永无终止,是人类精神的根本矛盾。哥德曼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弥合“应是与所是、悲剧和希望、历史与结构”的辩证方法,从而经由这套方法,不但可以形成一种科学的社会学,而且能够形成一种关于普遍的人的社会之辩证研究。哥德曼推崇悲剧辩证法,按照他的解释,这种辩证法一是突出总体性,二是强调主客体的同一性。哥德曼所处的时代,正是各种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激烈斗争的时期,对于何谓“正统性”的争论不绝于耳,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在于其“方法”,而这一方法的核心范畴就是总体性。从这一点而言,哥德曼的确是卢卡奇最忠实的学生,因为他也始终坚持“总体性范畴是辩证法思想的核心”。但他所说的主客体的同一性,则既不同于黑格尔、卢卡奇的绝对的同一性,也不同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而是一种所谓“部分的同一性”。哥德曼

对信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信仰与“打赌”联系在一起,认为信仰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思想形式,而是一种交织成功的希望和失败的可能性的行动。他进而强调,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信仰,一种对于人类集体力量可以实现本真人类共同体的实践哲学。当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实悲观、失望时,他却鼓足勇气,对于希望和成功的可能性进行“打赌”,坚定本真人类共同体必然实现的信念。

二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致力于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综合在一起的思潮。由于它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所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它也属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派别。作为一股企图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的思潮,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形成,但它真正获得较大发展,并产生实际影响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既是精神分析学朝社会心理学方向发展的产物,又与马克思主义面临新挑战密切相关。“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向是:①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关系;②综合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③运用“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实,“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是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这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重视社会因素与重视心理因素的综合。它的下述四个方面的理论都体现了这种综合:①人性理论:从生物本能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规定人;②社会批判理论:社会的批判与心理的批判之结合;③革命理论:心理革命与社会革命之统一;④意识形态理论:把性格结构作为联系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纽带。

赖希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也是由他在1936年最早提出来的。赖希的理论,以1934年为分界线,分为前期理论和后期理论。他前期理论的主要特点是“综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他的理论产生广泛影响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赖希提出,以里比多理论为核心的弗洛伊德早期的精神分析与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相通”的,两者具有三个共同点:①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而弗洛伊德早期的精神

分析学也是一门唯物主义科学；②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辩证的理论，而弗洛伊德早期的精神分析学也是辩证的，但凡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弗洛伊德在论述其精神分析理论时都坚持了；③马克思主义无疑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而弗洛伊德早期的精神分析学在本质上也是批判的、革命的。在赖希看来，他的性格结构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实现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改造”，更在于它能“补充”马克思主义中的不足。一方面可以用性格结构的概念“架桥沟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情况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沟壑，只要真正理解了人的性格结构是怎么形成的，也就不难解释经济发展过程怎样转化为意识；另一方面又可以用性格结构理论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意识形态何以具有相对独立性。赖希系统地提出了所谓“性革命”理论，他所写的《性革命》一书曾经风靡西方世界。他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理论成果，就是提出了性革命理论。赖希在建立他的性革命理论过程中再三表示，他不能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革命与他所设想的革命并不是同一回事。于是，他又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加以“改造”。他的这种“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改造”“用宏观革命代替一切”的观点，二是“改造”“把一切革命斗争都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观点。他详细地论述了性革命的意义，提出了“人的幸福是性的满足”的著名论断。他也对如何实施性革命作出了探讨，就如何对待家庭、如何对待婚姻、如何对待性道德等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看法。

马尔库塞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实际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他才在实际生活中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作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尔库塞的代表作是《爱欲与文明》，正是在这一著作中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爱欲解放论，而爱欲解放论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影响最大的理论。《爱欲与文明》一书的副标题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马尔库塞说，标题上讲的是“哲学探讨”，实际上是“哲学改造”。这种哲学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通过剖析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理论，“提炼”出人的本质是“爱欲”的思想，进而把人的解放归结为“爱欲的解放”；②批判了弗洛伊德把人类文明与爱欲解放对立起来的观点，论证了解放爱欲，建立一个确保人们爱欲得以满足的文明社会的现实性。《爱欲与文明》所体现的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把弗洛伊德的“爱欲”论“补充”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中，并把“爱欲解放”同马克思所说的劳动

的解放联系在一起；②通过批判弗洛伊德对爱欲受压抑的根源的分析，论证“统治利益”是爱欲受压抑的真正原因，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注重人类苦难的社会根源的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③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为批判“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根据。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是围绕着如何面对爱欲展开他的论述的，对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别出心裁的看法，例如为爱欲而战就是为政治而战、爱欲是性欲的升华、解放人的关键是将性欲转变为爱欲等。

弗洛姆与马尔库塞不一样，后者只是在一生的某一阶段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感兴趣，而他一生都贯穿着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追求。他的所有著作贯穿着对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加以综合考察、研究这根主线。弗洛姆与赖希一样，曾经竭力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并以此作为两者结合的基础。他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共同点：①两者都把“怀疑一切”作为理论出发点；②两者都坚信真理的解放力量；③两者的基本思想都是人道主义；④两者都运用了辩证的动力学研究方法。弗洛姆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学说的改造。他和赖希一样，认为马克思虽然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概念，并指出了两者的相互依存性，但并没有说明经济基础是怎样转变为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的。于是，他通过“改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提出“社会性格”这个概念，企图借此作为连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纽带之一。他认为，社会性格一方面在经济基础产生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起着中介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过程中也起着中介的作用。弗洛姆还通过“改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提出“社会无意识”这一概念。他认为，他之所以揭示出社会无意识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促使人们从麻木和幻想中醒悟过来，自觉地通过对现实的认识，使停留于无意识中的经验上升到意识的领域，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具体地阐述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同社会性格是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一样，社会无意识也是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所不同的是，社会性格的“中介作用”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过程造就了社会性格，社会性格又决定和支配着人的思想；而社会无意识的“中间环节”则主要体现在人们参与社会的经济过程，具有关于社会事实的经验，有些经验停留于无意识之中，有些经验则穿过无意识，达到意识的水平。关于社会事实的经验，要成为意识形态，社会无意识是必经之路。它必然先是无意识，然后才成为意识。至于弗洛姆最有吸引力的爱情伦理学，则对什么是爱以及

如何去爱等作出了阐述。

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相抗衡的主要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主要思潮。这一思潮自形成那天起,就把理论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一思潮试图把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其实质是对恩格斯哲学路向的某种程度的回归。它不仅对西方一些主要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拉美一些国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的众多话语体系中,“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扮演着相当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其学术影响力极为深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20世纪初结构主义在西方各国的兴起并逐渐风靡全球,扩大了以结构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以奠基人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这一思潮,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独特的解读方式、坚定的政治立场及鲜明的理论风格,在学派林立的西方思想界可谓“一枝独秀”。具体而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批判人道主义,不把它当做评判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尺度;第二,强调静态的、“共时态”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而不是动态的、“历时态”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第三,把意识形态问题作为研究的一个重点;第四,提倡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第五,重新解释劳动,将异化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中驱除出去。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开创者和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个人命运的曲折、精神疾病的折磨及由此所酿成的家庭悲剧并没有遮盖阿尔都塞的哲学光芒,他以严谨的哲学笔触和极大的政治热情写下了一系列的论著,其中《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是最主要的著作,正是这两部著作使他成了独树一帜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意识形态”、“科学”是贯穿阿尔都塞成名作《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在阿尔都塞的视线中,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很分明的界线,要想跨越这条界线,必须经历一次质的飞跃,即由意识形态发展到科学,必须对前者进行一次基本结构的彻底改变,这就叫“认识论的断裂”。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学说的发展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马克思的学说也不例外。马克思从

青年时期到成年时期,由于创立了新的历史科学而导致了自身理论深层结构的裂变。这种裂变,既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断裂,又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历史性断裂。意识形态与科学的严格区分及认识论的断裂引发了阿尔都塞的另一个重要论题: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由于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这一针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性口号,他又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反人道主义派”。阿尔都塞认为,以1845年断裂时期为界,之前马克思的理论属于意识形态,称为“理论上的人道主义”,之后马克思的理论是科学,称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可以被视为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次彻底清算和理论反驳。围绕这一论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阿尔都塞和当时的法共政治局委员、哲学家加罗蒂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又在70年代初期和波兰哲学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沙夫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阿尔都塞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中提出了“依据症候阅读”方法。他认为,文本的“缺失”、“空白”、“严格性上的疏忽”就是他所谓的“症候”,通过察觉这些症候,可以揭示出文本深处的问题框架。阿尔都塞关于“依据症候阅读”的论述为我们在如何阅读文本方面开辟了一个理论的新视角。

作为阿尔都塞学生的普兰查斯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普兰查斯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国家、阶级、权力、专政及意识形态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主义的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和学术同路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其影响无疑是最大的。普兰查斯对阿尔都塞学说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沿用阿尔都塞的有关理论概念,比如“多元决定”的概念;第二,采纳阿尔都塞的有关理论方法,比如依据症候阅读法;第三,承袭阿尔都塞的有关理论框架,即运用了结构主义这一工具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除了继承阿尔都塞思想的精髓,普兰查斯还毫不留情地对阿尔都塞的学说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认为阿尔都塞没有给予阶级以相应的地位;第二,认为阿尔都塞没有把“国家机器”和“经济机器”区分开来,从而削弱了经济机器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三,认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解释是不妥当的;第四,认为阿尔都塞“理论实践”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普兰查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并没有从理论系统化的角度专门探讨政治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本身直接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以应当精心制定出一套政治理论的基本概念,重建马克思的

政治理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是普兰查斯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国家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简单工具,而是作为“历史动力”的政治斗争的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并不表现于封建社会式的以王权原则为代表的神的旨意,而是表现于个体公民形式上的自由平等,表现于大众的主权和国家对人民的世俗责任;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取决于资本主义形态中的政治和经济斗争方面的特殊自主性,取决于政治和经济权力以及政治和经济方面阶级利益的特殊自主性。他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认为阶级是社会行动者构成的群体,他们主要按照其在生产过程,即经济领域内的实际地位来确定。但是经济因素并非划分阶级的唯一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在分析社会阶级时,都摆脱了单纯的经济标准的界限,而十分明确地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标准。

巴里巴尔同样是阿尔都塞的学生和追随者,他是至今在西方世界仍然十分活跃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巴里巴尔继承和发展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以自己简洁、精彩、自由、独到的文风对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重新诠释,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分析马克思思想演变的过程中,巴里巴尔与阿尔都塞的做法基本上保持一致,即不满足于一般地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而是注重探究马克思主义在形成过程中的艰难曲折性,突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自我否定、自我中断及自我修正。这种做法显示了结构主义的一般特点,即强调“断裂”,提倡以静态的“共时态”的研究视角来代替动态的“历时态”的研究视角。巴里巴尔所提出的不同于阿尔都塞的另外两次“中断”,虽然带有某种独断论的色彩,但是显示了自身独特的理论视角。巴里巴尔的《马克思的哲学》一书,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作为哲学家的个人的思想加以剖析,并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所引起的争论进行了阐释,给整个法国乃至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巴里巴尔强调,马克思采用的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占领全部当代哲学的研究领域;马克思的思想是极具开放性与创新性的;马克思的哲学存在于他的学术整体中(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经济学著作)。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主要有以下两层意思:第一,用于解释阶级斗争如何决定性地介入历史的逻辑和形式;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基础是革命的——不能不改变。巴里巴尔参与了《读〈资本论〉》的写作,他写了其中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这部分内容。尽管容量并不是非常大,只有十万字左右的篇幅,但是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以至于该书在1968年再版时,阿尔都塞

删除了其他人所写的部分,唯独保留了巴里巴尔所写的这部分内容。在这部分内容中,巴里巴尔认为阿尔都塞在前面章节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关于历史的总的科学理论。在这个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建立的“生产方式”这一中心概念具有整个历史哲学传统断裂的认识论作用,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都毫不相容。

四

“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另一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思潮。它的出现同样表征了对恩格斯哲学路向的某种回归,它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法国,其代表人物也主要在法国活动,而“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在意大利形成,其代表人物进行理论活动的舞台是意大利。它兴起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之后,经过10年的发展,当其主要创立者德拉-沃尔佩退休以后,它就开始衰落。尽管这一学派不再存在,但它所倡导的思想一直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要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证性和科学性。从它形成的那一天起,它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和其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尖锐对立。其特点具体如下:第一,主张以科学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科学的方式扎扎实实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第二,主张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统一,其中科学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的基本特征;在对待辩证法的问题上,主张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非连续性;主张恢复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权威,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具有科学精确性和预见性的学问。由于“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这些鲜明的特点,从而它要比“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对恩格斯的哲学路向,特别是对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路向的回归。

德拉-沃尔佩是“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开创者,“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时直接被称为德拉-沃尔佩学派。《卢梭与马克思》一书是德拉-沃尔佩的代表作。这本容量并不是很大的书自1957年至1964年之间一共连续出了四版,在意大利乃至西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引发了强烈的思想地震。在这本书中,德拉-沃尔佩主要借助于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深入地分析了卢梭关于人的自由、平